

# 敬烟的习俗

□雨茂



从曾祖父起，我们家三代没有人吸烟，爷爷不吸，他的四个儿子都与烟绝缘，但从我这一辈起，堂兄弟中有一半烟民。小时候我经常看到身边人吸烟，四川人称“吸烟”，家里来了客人，即使遇到熟人，烟民都要相互敬烟，如果搞不准别人是否吸烟，总免不了问一句：吸烟不？不吃烟的就会摆摆手说“不会”。父亲就是那个常说不会的人。

小时候，我根本不懂吸烟的危害，加之当时吸烟的风气很盛，很多有权有势、有钱有身份的人都吸烟，所以觉得吸烟很时髦，不吸烟的人似乎不够潇洒，并不认为不吸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院子里有些小孩比较调皮，想法把大人抽的香烟偷出来让小伙伴们尝鲜，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吸过烟。旱烟却没有人偷出来吸，味道太冲。在当时的农村，纸烟是新鲜玩意儿，价格也不是一般烟民消费得起的，所以小孩并不能常常抽到纸烟。有些烟瘾大的孩子就用纸卷干枯的红薯叶子抽，我也尝过，那味实在与柴草烟雾没有任何两样。小学时，同学中流行玩一种叫扇(或打)烟牌的游戏。把包装香烟的纸小心地揭开摊平，折成等腰三角形，有字的一面朝外，用力拍在地上扇，烟牌翻转算赢，由香烟价格高者先打。大人往往烟还没有抽完，烟盒就被小孩预定，烟价越高，就越抢手。扇烟牌的小朋友对香烟的行市烂熟于胸，比老烟民还门儿清。痴迷于扇烟牌的孩子长大后普遍爱抽烟，这可能缘于当时流行的烟牌游戏。我没有迷上抽烟，可能因为家里大人都不抽烟，很难获得香烟盒的缘故。

读中学以后，学业紧张，学校禁止抽烟，所以很少接触到香烟，虽然同学中也有烟民，但都处于地下状态，没有人敢于公开挑战校规。但老师中有烟民，有的甚至边上课边抽。读大学时，同学中已经有一些烟民了，男生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免不了抽一支烟，一来二去，有的同学就上瘾了。但我对抽烟后第二天早上嘴里发苦、口气难闻很在意，所以并没有成瘾。

工作后，经济独立了，请客时免不了买烟，陪着客人抽两支，吃请时也常常被老烟民诱导着吸一支。只要有聚会，总是少不了香烟助兴，别人吸烟，不抽同样要吸二手烟，干脆一起熏吧！有人告诉我，吸烟时从不吸进肚子里，从口腔进，从鼻孔出，这在资深烟民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聚餐时如果包间里有三四个人吸烟，基本上满屋子乌烟瘴气，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可害苦了不吸烟的朋友。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回家后头发、衣帽、提包

上全是难闻的烟味，妻子嫌，孩子厌，即使全身衣服换尽再来个彻底的沐浴，也很难消除顽固的烟味。有个朋友很少参加聚会，因为受不了烟味，他曾对我吐槽：“那味比下水道还臭。”

随着社会的进步、控烟政策的施行，越来越多的人或者去吸烟区吸烟，或者戒除香烟，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吸烟。在我身边，年轻人吸烟的比例明显低于中老年人。也有少部分年轻人仍然对香烟情有独钟，但他们在家里已经被妻儿赶到厨房开着抽油烟机吸，在单位，则被赶到厕所、楼道等地方。一个烟民朋友抱怨，开着抽油烟机吸烟有什么意思？最好是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躺在卧室大床上，点上一支烟，边看书边对着天花板吐烟圈，别提多美了！我猜测他如此神往这种吸烟方式，估计是因为妻子压根就不给他这种待遇。当前，中国许多城市的公共场所都贴上了禁烟标志，但没有禁绝吸烟，一方面是管理不到位，一方面是有些烟民根本不拿规则当回事。幸好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对二手烟说不，少数烟民才不敢恣意妄为。

2014年去台湾，见烟民基本都蹲在下水道旁边吸烟，公共场合都禁烟，景区专设吸烟区，没有人边走边吸，鲜见相互敬烟。近邻日本控烟更严，法律禁止20岁以下的青少年吸烟。许多城市大街不允许吸烟，如吸烟只能到指定区域，违规者如被“巡逻指导员”发现，将处以1000日元至2000日元罚款。

在中国大陆，烟民的生存空间还很大，有人公开宣传吸烟并不影响健康。在这种香烟文化的熏染下，婚宴、寿宴、满月宴甚至白事的酒桌上，都少不了香烟侍候，主人甚至还要站在大门外敬烟迎客。常言道，无酒不成席，其实无烟也不成宴。有人公开宣称，“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我在外工作多年了，虽然平时基本不吸烟，但回老家也要买烟，遇到成年男人还要上烟。我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但入乡随俗，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老乡嫌弃，说某人家的儿子是大学老师，回家连香烟都舍不得买。

目前，香烟已成社会公害，一方面污染空气，造成呼吸道及肺部疾病，另一方面致使部分青少年沉迷香烟不能自拔，严重影响身体发育。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严厉的控烟政策，上海已经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条例，今年3月1日开始实施。烟民有吸烟的自由，非烟民也有拒绝吸二手烟的权利，吸烟者应该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从香港『茶花女』到『乡土』叙事

后人久久怀念声筒的小说，这也成为香港文学的一种历史缩影，足以让结果，刘以鬯称赞《穷巷》是“写人间疾苦而不做政治扬声筒的小说”，这也成为香港文学的一种历史缩影，足以让后人久久怀念。

□黄万华

1936年，嘉宝(Greta Garbo)主演的《茶花女》让这位世界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提名；五年后，一部香港“茶花女”影片《蓬门碧玉》由南洋影片公司摄制完成。七十多年后，这部影片被人从美国旧金山寻回，立刻成了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珍藏之物，因为上世纪三四十代的香港电影喜欢改编外国作品，而这部电影“茶花女”却是由一篇香港小说《黑丽拉》改编而来，小说作者和影片编剧都是香港本土小说家侣伦(1911—1988，出生于香港九龙，原名李霖)，他被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充满敬意地称为“香港新文学作家中真正具有‘文学史’身份的第一人”。

《黑丽拉》有着《茶花女》男性忏悔式的叙事声音，而与《茶花女》最大的不同是，《黑丽拉》“茶花女”式的悲剧发生在南洋女子黑丽拉和穷作家“我”的相爱中。流落到香港打工的黑丽拉强悍、自尊，生活困境中与华人男子“我”产生了真挚情感，但最终被都市浮华、社会流言所吞没。

侣伦1928年开始发表小说，华洋杂处的香港社会中的异族形象，是其早期小说所显现的香港文学的特异之处。《永久之歌》描写了在德意志的星空下三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友情，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共同追求。名门之女戴茵罗倾慕出身木匠之家的哈莱，而出身望族的史密德久恋戴茵罗，却以成全哈莱和戴茵罗之姻的善良心地作出自我牺牲；哈莱知道事情真相后，隐迹江湖；欧洲大战中，哈莱双目失明，史密德阵亡战场，戴茵罗别墅夷为焦土，仍在回响的是这三个年轻人对友谊、爱情的执着追求……小说将这些情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在对异族青年男女的命运、追求的理解中表达了人类相通的爱和美。

《无尽的爱》更进了一步，以“我”的视线写出了人类历史中一种历久而来的悲壮。小说在日军占领香港城区的真实背景下，以中国人“我”(戴克)的眼光，在葡萄牙少女亚莉安娜的遭遇中浓缩起人类苦难。亚莉安娜的母亲和弟妹身亡于日机轰炸之下，新婚前夕，未婚夫巴罗奔赴前线成为

义勇军机枪手，被俘后为跟亚莉安娜早日重聚而越狱，在越狱过程中牺牲。亚莉安娜对战争的理解显然早已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她原先跟巴罗约定，要一起进入中国内地，当“对日本作战”的“志愿兵”。巴罗遇难后，亚莉安娜忍辱含垢，一心为未婚夫复仇。耳闻目睹中国民众在日本武力下“简直是地狱”一样的生活，更坚定了她复仇的意志。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控制住自己，跟日本宪兵队长佐藤周旋，用每周六夜里一杯咖啡所下的慢性毒药终于让佐藤命归黄泉，她是为了巴罗“勇敢的爱而同样勇敢地去接受死”。小说结尾写到“我”在弥敦道上目睹亚莉安娜从容就义：“她昂起头来傲岸地走着，乌黑的长发微微地飘动；两只圆大的耳环闪着金色的光芒，一步一步地走向囚车。”这情景，会使中国人都“联想起法兰西大革命的恐怖时代，那些昂然踏上断头台去为自由而献身的女英雄”。在这种人类共有的历史悲壮中，充溢着的是人的尊严。小说中“我”和亚莉安娜的交往，甚至冒险营救她，都发生在“人类的一点真纯爱”中。《无尽的爱》作为香港文学中难得的反侵略小说，其所抵达的高度在整个中国抗战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是突出的。

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侣伦曾流亡内地，思想倾向于左翼，战后返回香港。当时的香港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峙，但“侣伦思想行为‘偏左’，笔下的‘左味’却淡”，他关注里街小巷的香港底层民众生活，开拓了香港“乡土”叙事的重要流脉，他最成功的作品——长篇小说《穷巷》(1948)由此诞生。小说在“香港，1946年春天”的“序曲”中展开了战后香港的全面描绘，通过讲述香港一间狭小简陋的住房中四位相濡以沫的穷朋友的生活，反映“香港，迅速地复员了繁荣，也迅速地复员了丑恶”的现实。新闻记者高怀抗战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战后失业；军人莫轮抗战前线作战致残，复员后捡破烂为生；同是抗日军人而被遣散的杜全更是生计无着，无奈中投奔莫轮；小学教员罗建工薪微薄，全力支持着这“一家四口”的租金，还和高怀一起搭救了被逼自杀的女子白玫。小说以“住”的困窘凸显了香港的生存环境，在一间四个男子的小屋再挤进一个年轻女子的独异的“家”的环境中写出了战后香港贫民的命运，也在香港的世态人情中写出了人物的善良坚韧，风雨共舟，相濡以沫，这种小人物的历史才是地道的香港历史，充溢着香港民间的情义和生命活力。小说结局，杜全在被人诬陷入狱后，又断送了与阿贞的婚事，绝望自杀；包租婆周三姑将高怀等赶出木杉街，高怀仍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是有前途的！”表现出一种理想情怀。

《穷巷》作为最早“全面深刻写香港现实的作品”，是侣伦深入开掘香港文化资源而超越当时香港“政治化”状态的结果。刘以鬯称赞《穷巷》是“写人间疾苦而不做政治扬声筒的小说”，这也成为香港文学的一种历史缩影，足以让后人久久怀念。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